



# 性別覺醒

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

譚少薇 葉漢明 黃慧貞 盧家詠 主編

商務印書館

# 性別覺醒

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

譚少薇 葉漢明 黃慧貞 盧家詠 主編

商務印書館

## 性別覺醒——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

---

主 編：譚少薇 葉漢明 黃慧貞 盧家詠

責任編輯：楊安兒 蔡祝音 陳穎賢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精裝）978 962 07 6490 5

（平裝）978 962 07 6491 2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序 一

作為女性或男性在現今社會有甚麼不同的遭遇？男尊女卑或陰盛陽衰有甚麼前因後果？許多人對這些疑問都有個人理所當然的意見。我們又應該如何辨別事實與偏見？

性別研究建基於跨學科的理論和科學探索，分析男女之間和性別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性別覺醒——兩岸三地社會性別研究》扎根於本土社會文化，讓我們更深刻和貼切地認識社會與性別的真諦，肯定倡導性別平等是促進社會進步的現實。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講座教授暨系主任  
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  
張妙清

## 序 二

時至今天，“男主外、女主內”、“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些傳統思想仍然像緊箍咒，束縛着現今各階層女性。

一位 80 後的年青女性跟我說，不想參與立法會選舉，擔心自己“太叻”，找不到男朋友。這類想法，再加上其他因素，難怪在立法會和區議會女性比例，連兩成也不到，只有 18% 左右。

香港中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譚少薇教授等編制這本有關本華人社會性別研究的書，希望能夠讓更多人關注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互相包容、共同參與、活出自己，面對異性，期望不再卑躬屈膝了。

香港工會聯合會榮譽會長  
陳婉嫻

# 序 三

本書由多位資深性別研究學者，以兩岸三地的性別研究為脈絡，勾畫出近代華人社會的性別研究的歷史進程，並就性別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方法論、性別研究的社會實踐等以具前瞻性視野進行深刻的闡述。本書作為一本學術著作，不僅在知識內涵上極具價值，而且對加強大眾關注性別平等亦作出了重大貢獻。本人在此誠意推薦。

香港立法會議員  
劉慧卿

# 序 四

傳統的性別觀念影響着各地的文化和社會發展，以及個人的價值觀和生活細節。平等機會委員會一直關注“性別定型”的情況，支持“性別觀點主流化”，期望兩性可以公平合理地共享社會的資源和機會。這會議論文集涵括中、港、台的性別研究精粹，讓讀者從多角度理解及反思與性別有關的議題，值得向讀者推薦。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創平等共融的社會。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林煥光

# 導言

譚少薇 葉漢明 黃慧貞

性別常被誤以為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理特徵，事實並非如此。<sup>1</sup>女性或男性的生物性特徵只是起點，真正影響着人類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是人們對這些生理特徵的解讀。所謂性別，就是社會如何理解女性和男性的生理特徵，進而構築一套對性別關係的詮釋，並且以這套知識作為社會生活的基礎：諸如經濟分工和政治權力的分配，法律的內容，婚姻、家庭和宗族的制度，以至孩童教養的標準，職業的抉擇和事業發展，以及宗教儀軌等各個生活範疇，都以性別為指導性的組織原則。在不同的歷史時空，性別知識和規範不斷與經濟、政治和宗教等社會結構和制度互動，產生了對社會與文化的決定性影響。性別也是個人身份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未出娘胎，性別便可能決定了孩子是否能夠出生；甫出娘胎，孩子是否獲得適切醫療照顧與平等的教育機會，以至他成長後的就業和社會流動的機率，也往往取決於他的性別。明顯地，社會給予不同性別的資源、地位和價值是不一樣的。性別因此是個人與羣體的價值判斷和世界觀的核心部分；不認識一個社會的性別系統，我們便無法了解它的信仰體系、文化象徵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及它的藝術內容與意涵。故此，性別不單只是男與女的體質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它是有關這些體質差異的界定準則，和這些界定準則建立其上的認知與價

---

1. “性別” (gender) 或稱“社會性別”，本書內兩詞通用。“性”則專指 sex。



值。也就是說，性別是一套有關性的差異的知識體系。<sup>2</sup>

性別作為知識體系，以性別二元論影響最大。它把人類分為男女兩類，認為兩性之間的生理差異是普遍定律，並推論男女的心理和情緒特質也不同，因此兩性的工作能力和興趣也是天賦而不一樣的。這種把性別以二元分割的生理決定論，滲透於社會制度和架構當中，把男女分工合理化，把社會上的權力不對等情況正常化。偏執的論述把人類的智力、體力、氣質、興趣等簡單化地分為兩類——即男性和女性的，並以之發展出醫學、教育和法律的相關理念，影響着公共政策的設計、建築和空間的運用，以及信仰與藝術的表達方式。兒童在社會化過程中，學習“女孩的”或“男孩的”的典型行為、玩耍內容，以至服飾和裝扮的顏色和款式 (Bern 1981, 1983)。<sup>3</sup> 青少年則以“性別適當”的方式與同性或異性相處；在學校、家長、朋輩、傳媒的趨同訊息中，被引導到符合他們性別身份的學科、事業和家庭崗位上進行着性別角色的再生產。<sup>4</sup>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被性別知識深深地影響而不自知，而且通過每天不斷重複實踐這些對性別的解讀，久而久之對性別二元論深信不疑，以至於贊同一些典型化觀點，如男性來自火星、女性來自水星般的性別鴻溝。<sup>5</sup> 對於個人來說，性別知識體系把人們培養成為相同的羣組成員，以便他們擔任預設好的社會位置。<sup>6</sup> 這類論述無視不同性別的個人之間其實大有共通之處，也無視相同性別的個體之間大為差異的現實。被簡化的性別知識，直接產生的社會後果就是大量個人潛力被埋沒，個人的

- 
2. 有關性別的知識論，歷史學者以其歷史視野對性別知識的建立有深刻的討論。參考 J. Scott (見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994) 和 S. Mann (見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 S., 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3)。對人類社會中女性的角色發展，可參考 M. Rosaldo and L. Lamphere 合編的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1974。
  3. 參考 Sandra Bern (1981, 1983) 有關兒童發展理論與性別的關係。
  4. 關於性別角色理論的發展，參考 Eckes and Trautner (2000)。
  5. 普及讀物如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John Gray 1998)，大大地強化了性別二元論及生理決定論在社會上的普及化和負面影響。
  6. *Paradoxes of Gender* (Judith Lorber 1994) 對性別的社會角色及其種種深層問題，有全面而獨到的討論。有關性別同一化的討論，參見該書第一章。

興趣和性格被壓抑。

在學術領域，社會性別的知識論、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自 20 世紀 60 年代，隨着美國民權運動及第二波女性主義席捲歐美。女性主義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學術體系，挑戰傳統的學術研究，開發了影響深遠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並為學術界糾正了長久以來的盲點。在這段開拓期，性別研究以婦女研究為主要內容，針對世界人口的一半——女性，發掘了大量新資料，如女性在漁獵採集社會中對經濟生計的投入、在部落社會中政治權力的行使，到工業社會中的家庭分工的轉變等，補充了多方面的資料，使我們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解，不再局限於單一的男性視角。在生物及醫療範疇，學者指出人類的性別起碼有五種；而按不同的文化準則，性別或有七種。在不同的社會，性別身份有時可以轉換或重新界定。性別研究也為人文與社會科學帶來嶄新的視點，尤其為社會調查提供了方法論的新方向，挑戰實證主義對於社會現象的前設準則，並打破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成為後現代主義跨學科研究的基石之一。<sup>7</sup>更重要的是在對人類本質的探討上，性別研究以銳利的觸角與思辨，指出了兩性之間的所謂本質上的差異，不過是文化建構的後果，為了解社會身份認同與公民權利的意識，提供了根本的概念轉變與理論範式轉移。

這股思潮在亞洲地區於 80 年代初明顯滋長。1985 年，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機構不約而同成立了性別研究課程或研究所。在往後 20 年間，有關性別的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課程在華人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而另一方面性別研究學者也通過社會行動實踐，對社會上的性別平等作出推動的作用。<sup>8</sup>綜合而言，性別研究學者擔當了幾種社會角色：分別為教育者、研究者和社會行動者。21 世紀到來了，性別研究在華人社會中的角色有着怎樣的改變？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它的前路如

---

7. 性別視角在不同學術範疇中的應用與批判，可參考 Hesse-Biber 等編的 *Feminist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Methodology* (1999)。

8. 198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檢討了從 1985 年起性別研究的發展，可參考張妙清等編之會議論文結集 (1995)。

何？為全面探討這些問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和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於 2005 年聯合舉辦了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近二十年華人社會性別研究：回顧與前瞻》。與會者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及台灣多位資深性別研究先驅，也包括了近年參與性別研究的年輕學者。當世紀之交，兩岸三地學者聚首一堂，檢視各自的歷史足跡，比較彼此的成就和困難，為未來、在新的世紀的發展，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回顧，並作為再出發的起步點。以該次會議的報告和討論為基礎，本書收錄了共 17 篇論文，包括部分與會者的報告，以及一些會後的特約文稿。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展示兩岸三地的性別研究的發展脈絡：從社會變革與性別研究在高等教育的學科建設，到女性主義學術研究方法論的發展、人文與社會科學中不同學科的個別研究課題，以及性別研究的社會實踐與體制發展的互動。

本書的第一部分回顧了華人社會中，自 80 年代起 20 年間急劇的社會變革，為性別關係提供了一個怎樣的文化環境、對性別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和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性別研究學者作為教育者，在不同高等教育院校在各自的資源與結構的限制下，開展性別教育與學科建設，體現了教育者的理念、對下一代的責任與堅持，以及學術上的拓荒與創新精神。

在中國大陸方面，呂美頤回顧了 20 年來婦女 / 性別研究的發展歷程。在肯定研究隊伍壯大、研究成果豐富、研究視角多元等成績的基礎上，她強調與海外學術界的密切交流合作，以及民間團體與婦聯系統在研究力量上的聯合，是中國婦女學和性別研究發展的必備條件。她認為要突破體制與觀念上的諸多限制，未來的研究應借鑒和吸收西方理論精華，建立一個開放、以西方女權主義為參照的理論體系，和推行性別意識主流化。多個華人社會中的女性，因地區文化、族羣等差異，而出現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應成為跨地區合作研究的重點。她又提醒，性別研究學術地位的提高、敦促政府實現性別意識進入決策主流，和在全社會普及性別意識三方面的工作必須配合。

謝臥龍從男性的角度出發，對台灣解嚴以來的婦女運動，和性別研究發展的學術風潮，分享他的觀察與體會。婦女運動隨著政治改革的氛圍而起，對台灣近年的政策發展、婦女工作及教育機會的提升、社會對性別平等的認同，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學術上，性別研究及婦女研究在各院校紛紛建立，學術研討和著作成果甚豐。近年的議題包括同志運動、跨性別、性少數的性態，及性工作者權益的問題，都引發了熱烈的社會討論和學術回應。從一個男性的女性主義者的視角出發，謝臥龍提出一個重要的策略考慮：要針對男性進行有關的覺醒教育，讓他們得以更投入參與建設更平等的性別關係，向女性主義的理想共同推進。

在學科建設方面，中港台的發展各有不同特色，而面對的困難也不盡相同。譚少薇和葉漢明一文為性別研究 / 婦女學在香港高等教育界的發展歷程做了一個綜合回顧。性別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經歷時代的轉變而發展，初時與本地女權運動無直接關係，後來隨着 70 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和女性社會地位轉變，以及 90 年代社會上出現女性公民權的爭議，學術界逐漸作出積極的關注和回應。另外，80 年代提倡女性覺醒的組織和學者數目大為增加，性別研究中心及有關課程先後在大學和大專院校中開設，並將女性主義觀點引進教學與研究之中。90 年代香港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文化觀念的轉變，原為性別研究課程的發展提供良好氛圍，卻又礙於高等院校急劇轉趨市場導向的學制發展，使課程始終停留在主流學科的邊緣。在文章總結部分，她們指出學者必須改變體制內對性別議題邊緣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學者也要聯合起來主動締造有利的社會文化氛圍，建立有效的學術和社會行動網路，從而使性別研究的影響得以鞏固與持續發展。

在台灣，高等教育中婦女與性別研究課程的建設，源於台大婦女研究室的跨校、跨學科性別教育的實踐。按林維紅、陳秀曼分析，“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亞洲婦女研究課程規劃”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的建設和執行，一方面引導學生作專業思考；另一方面，同一主題、不同學門的討論

有助學生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入門訓練。在此基礎上，研究理論、研究方法、經典研讀、實務應用等專題課程提供了全面的訓練。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宗旨貫穿整個教育過程，並藉着網路科技，加強學校、學科之間的交流。一個完善的教學環境的形成，仍有賴各界研究資源的互相扶持。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魏國英的文章指出，女性學課程逐漸從分散於人文社會科學及某些自然科學的課程，邁向比較專門、獨立的女性學研究課程轉化和集中。各高校開設的性別相關課程，是根據各自的校情和學科特點進行設計規劃的，因此內容上也存在較大差異。當中的弊端包括以下幾方面：基本理論研究缺乏深度和廣度，導致課程內容原創性不足；研究隊伍的理論準備和素質差異，造成課程內容與教學品質參差不齊；建制和編制上的滯後與薄弱，干擾了科研與教學力量的充實和穩定。魏國英認為對於這些制約女性學課程建設的問題，研究者和工作者都有責任主動承擔並加以解決。<sup>9</sup>

杜芳琴的文章，以其在天津師範大學創立婦女學的親身體驗，為性別研究的跨學科發展提供多項啟示。婦女學通過教育和學術成果影響人們的性別觀念、行為乃至思維和道德模式，不啻是一場文化革命。它以批判和反思的眼光和知識去解構知識權力的等級，因此必須實踐學術女性主義的理念，同時注意研究、課程和機制建設的並重。除了警惕商業化、權威主義等因素的誘惑和侵襲，還應適當促使改變的對話與合作；跨界合作既建基於尊重、包容、互信的關係，也必須保持學術獨立的自覺。杜芳琴認為無論處於邊緣，還是進入主流，婦女學同道都應始終保持批判的眼光、勇氣和創新的熱忱。

本書第二部分展示了性別學者作為研究者，在不同學科範疇進行的觀察與分析，以歷史學、宗教研究、文學、戲劇，以及人類學，探討華人女性在經典與普及文化之中的多種形象和參與，而且在方法論上以自省和前瞻性反思，為學術界

---

9. 有關婦女／女性學作為獨立學科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另可參考孫曉梅編《中國學科與課程建設的理論探討》（2001），以及魏國英、王春梅主編《教育：性別維度的審視》（2007）。

提供嶄新的思維。蔡玉萍與杜平有關性別研究的方法論一文提供了從婦女學發展到性別研究的一個反思。女性主義研究的起始，從“對女性所做，由女性所做，和為女性所做”的認識論出發，填補了過去對婦女各方面資料的缺乏。她們認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婦女學應正視自身的缺點，更正其對性別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忽略，和將女性和男性單一化的問題，以性別研究的概念代替婦女學研究，進行諸如性別差異、性別規範、性別分工，及性別身份的多維分析，探討其中的複雜性和性別之間的相互性。她們提醒：以性別關係的視角出發的研究方法，還要兼採定量和定質研究的所長，使研究發揮最大的創意和效果。

黃慧貞從過去的宗教研究與性別研究的發展，整理出分別從經典詮釋、宗教歷史傳統，以及宗教符號象徵三方面的重點和方向。宗教與性別研究的理論主要由西方發展過來，近年漸漸應用於中港台的宗教婦女研究之中，促發了不少成果。文章結合作者多年研讀基督教聖典的心得，通過詮釋理論提出對聖經的多重女性主義閱讀介入，開放聖典中似乎一面倒的父權世界，發掘其中性別互動的多元空間。另一方面，她借用美國宗教歷史研究的經驗，提出婦女在歷史以及象徵的運用之中的多元面貌，可以從婦女日常生活中找出婦女抗衡政治的端倪，作為一個適用於華人社會的發展方向。檢視過去 20 年的華人宗教及性別研究，可見成果漸豐。

在歷史學的範疇，性別研究相當活躍。葉漢明的文章以中國最早的通俗畫報《點石齋畫報》中有關妓女的大量資料為基礎，整理出 19、20 世紀之交華洋雜處的上海的社會面貌，並以之透視傳統與現代、公與私範疇、性別關係等命題。作為英國人在上海引進新聞大眾化的個案，《點石齋畫報》的題材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所關心的事物與觀點。葉漢明指出，畫報中有關妓女的細緻的繪圖和大膽的描述，反映了當時的情色文化；但由於相關的論述卻充滿批評和訓誡，重複表達了男性中心的道德觀，因此，妓女的出現只是作為被觀看的客體和道德論述的手段。這種公共視覺文化的男性視角，表達了畫報既顛覆又教訓的雙重效果，但同時也讓人感受到伴隨着現代性的來臨，一個轉型時代的焦慮。性別關係，既是

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意象。

與上文作為一個對比，侯傑的文章的焦點在 20 世紀的 20、30 年代；然而他對當時《大公報》的副刊《家庭與婦女》的分析，對今日討論婦女、家庭與中國現代化的議題仍然饒有趣味。侯傑提出，報章副刊是時下社會潮流及文化發展的寫照，從它出發分析當年有關婦女時尚的描塑和意見交流，可以窺探當年時代風潮的發展脈絡。他就婦女衣飾、放足，以及家庭生活的健康和電氣化幾方面進行檢視，指出 20、30 年代的天津婦女，一方面對現代性和西化潮流趨之若鶩，另一方面卻遭受社會上保守勢力監察，處處顯得矛盾和無所適從。不過，即使如此，副刊因着編者、作者和讀者逐漸提高的性別意識和互動關係，無意間築構成一個女性發聲和女性主體表達的場所。

在文學與戲劇的研究方面，性別學者以文本與內容，以至語言與舞台呈現的交錯流動，探討的層次豐富而多變。姜進以莊周夢蝶故事的起源及衍變，考察了中國文化中有關性與道德觀念之歷史變遷。結合西方心理分析和女性主義研究，她認為歷史上各種版本的莊周夢蝶實乃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的再現。具有顛覆意義的是 2001 年在上海首演的越劇《蝴蝶夢》，從女性角度和生活經驗的層面，重新建構了關於性和道德的敘事。這部完全由女性創作和表演的作品通過塑造“主體性女主角”，大大減低了男性中心意識形態的影響。然而，女藝術家們以深厚的人性關懷進行的再創作，並沒有把對女性的關切建立在兩性絕然對立的概念預設之上。對於女性主義理論，她們並不在意。姜進指出，這恰恰對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人類學者柯群英的文章，掀開近年一個性別與文化的熱門話題：究竟科技文化的熱潮和其使用日趨普及，是多元性別空間的解放，還是父權文化的延伸？建基於美國近年方興未艾的網路虛擬文化研究，她引入上海與香港兩個城市對華人婦女網路使用的調查作比較。她發現網路使用的頻繁程度除了指涉婦女的年齡、階層和教育背景差異外，兩地婦女的不同需要也促使她們的網路使用發揮不同的功用。再者，女性的網路使用者正在形成一種虛擬社羣，在不同的共同興趣或目

標上相互結連，延展她們生活的空間。

本書的第三部分以學者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和社會行動者，他們以性別研究為基礎，通過批評和參與訂立公共政策，與被邊緣化的人羣——不論是女性或男性——站在一起，為推展社會公義作出貢獻。

蔡寶瓊對香港婦女運動的回顧詳細而尖銳。她認為女性主義意識的婦女運動在香港的歷史很短，過去 20 多年從來都不算是社會運動的主角，然而一開始便很有本土意識，以認同基層婦女權益為任。在 80 年代因着當時的政治氛圍，與社會運動一併冒升，參與促進政制民主化的過程。從 80 年代與殖民地政府交鋒到 90 年代與親中婦女團體的相抗衡；從早期關注對婦女的社會結構性剝削，到近年對性、流行文化及色情的討論；婦運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範式轉移。肯定的是，即使婦女的議題還未能成為主要社會議題，婦女運動的參與者對時代轉變的開放與及對女性自主意識的堅持，成為香港社會繼續進步一股不可或缺的動力。

面對中國近年的經濟起飛和全面投入全球化的努力，潘毅通過農民工的“打工妹”呼喚新一代“階級鬥爭”話語的重臨。因着共產黨政治對“工人”和“階級鬥爭”一直以來的政治挪用，加上全球化資本經濟對民眾牽起的慾望，在國家機器及跨國資本聯合的壓力下，今日的農民工是失語的一羣。本文以深刻的觀察，指出女工們空有被尊崇的工人的實質勞動，卻連基本的工人戶籍也沒有；再加上被規劃的、馴養的女性身體，她們為國策下的資本發展付出個人代價。不過，潘毅認為，雖然女工缺乏“階級鬥爭”語言，她們的打工——主體性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抗爭中展現出來，構成一定的“行動者回歸”的抗衡力量。

另一方面，在香港社會地下階層的生活也呈現性別差異。貧窮性別化並不是新的議題，只是過往對貧窮問題的理解多從女性觀點出發，並對貧窮的女性化作出研究。黃洪的研究將貧窮引入男性面向的討論，為這議題開拓新的關注。同樣是面對經濟衰退和轉型，女性以家庭需要為重，努力適應新的勞動市場需要。男性則為失去技能工種、工資下滑的情況，面對失去工作，而自尊受創、情緒鬱結，卻又拒絕接受低工資的服務性行業，寧願守株待兔或終日賦閒在家。黃洪提



出要解決男性貧窮問題，職業的配套和心理的治療同樣重要。

從譚琳對中國 20 年以來婦女 / 性別研究的刻畫，可見性別平等在中國近年的大幅改革之中，仍然步步為艱。一方面，在多個政府部門的領導、高等院校的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中國婦聯及中國婦女研究會等的多方努力下，婦女 / 性別研究已得到一定的官方肯定；而隨着中國國內對跨學科研究的日漸重視，一向以強調跨學科研究的婦女 / 性別研究有望會更受重視。但另一方面，從 2005 年以來的國家研究基金立項的分析，譚琳指出婦女 / 性別研究在重要領域如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經濟及科技研究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她認為，唯有將婦女 / 性別研究正式納入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領域中，社會中的性別平等、和諧的文化才有進一步推進的機會。

與譚琳的經驗相對照，在台灣，顧燕翎作為民間女性主義者走入政制內推行制定女性主義政策，既見機會又見盡建制中的限制與困難。這篇壓卷之作，為我們展示了女性主義的社會實踐的成功個案。顧燕翎具體地將女性主義引介到政府的層層架構中，增進各局處及委員會的性別意識，提高女性在各層議會和政府公職的參與，並發展出一種互相支援和激勵的網絡，實在難得。她在台北地區政策有關條文的細緻規劃和具體落實和執行，也是華人地區中少有做到的。女性主義能夠引入政策制定之中，配合了天地人和；不過，顧燕翎認為最着重的始終是有力的民間女性主義運動。女性主義官員可以做的是把握政制的脈絡，有效的運用資源去進行有關的改革和實務的推行；然而改革的動力和支持點必須來自活躍和不斷更新的民間女性主義運動。

縱觀中港台的現況，或者我們能稍稍慶幸傳統上對婦女的絕對不平等已然消滅（如 White, 2003），性別平等意識在社會上已獲得普遍認同。但是相對的不平等，卻更含蓄化的滲透在社會的深層，表現在日常的生活當中，而大家對之視而不見；而在不同的階段，更不斷出現父權主義的反撲。在全球化的世代，華人社會雖有長足的經濟發展，但性別的刻板化在教育制度、普及文化等多個層面卻方興未艾；女性的經濟邊緣化、家務的女性化，使婦女勞動者比起男性勞動者面對